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杨 凡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杨凡(1957-),男,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法学院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系博士生,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研究。

〔内容提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指导和处理当代国际关系,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对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灵活运用和深入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原则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制定国际战略和从事国际关系实践,对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都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国际政治思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中图分类号〕D 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74(1999)06-0112-04

邓小平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始终坚持并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其灵活地运用于国际、国内实践之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既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其国际战略思想的立足点。它作为一个完整的和平外交原则体系,反映了中国国际战略的一个重要思想,即以促进世界和平、争取建立平等公正的国际秩序来促进自身的国家利益。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形成于新旧世纪交替之际。邓小平以其战略家的深远眼光和强烈的国际意识,密切关注着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站在时代的高度,提出“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①。

首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主张是和平共处。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坚持了这一思想。他明确提出,“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②“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没有

和平环境,搞什么建设?”^③中国一系列对外政策和涉及对外事务的国策中无不包含“和平共处”这一根本思想和目标。所以,在很大意义上可以把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原则概括为“和平共处国际战略”。

其次,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平等互利原则为指导,邓小平把发展问题视为世界上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他指出:“世界上的国家富的愈富,穷的愈穷,解决这个问题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课题。”^④“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⑤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邓小平提出改变国际经济秩序,首先要解决南北关系问题。他认为:“南北问题不解决,第三世界负债那么多,日子怎么过啊!如果发达国家不拿出钱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发达国家在第三世界的市场也就没有了。”^⑥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带来障碍。邓小平把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发展经济的普遍要求同世界经济发展失衡、远远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视为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而且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实施了一系列解决这个主要问题的战略思想和

决策。世界各国都要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紧密合作,加速发展。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国与国之间的帮助是相互的,贡献也是相互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不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有多大的新发展。由此就可以看出南北之间密不可分,也说明了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相互遵循平等互利原则发展经济的重要性。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⑦“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⑧。这既是他的国内发展战略的根本思想,也是他的国际战略的第一位的重要思想。把“和平共处国际战略”这个根本思想和这个“发展经济”的战略思想结合起来,就可以把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概括为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战略思想。

第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原则,是邓小平确立以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国际战略思想的基础。维护中国的主权和安全,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一项根本内容,因为它不仅可以保证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而且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邓小平主张同世界上一切国家进行交往,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国家的根本利益。他说:“我们继续坚持同对我们友好的西方国家交往,继续坚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但是……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⑨邓小平始终强调必须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处理问题。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又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⑩事实上,各国的外交政策总是根据本国的国家利益制定并为之服务的。邓小平在1989年10月会见尼克松时就指出:“我们都关心自己的国家,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处理问题的。”^⑪各国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应高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由于国家利益的冲突和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也可能兵戎相见;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由于共同的目标,也可能和

睦相处,甚至结盟。可见,国家间关系的好坏并不是取决于意识形态的异同,而是取决于双方是否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否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二、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指导和处理当代国际关系是邓小平对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国际战略态势作出了“一边倒”的国际战略决策。到70年代,毛泽东又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和“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构想。可以说,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基本上是两极格局时期国际矛盾和斗争的产物。

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和外交家,邓小平实事求是,科学分析了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和本质特征,抓住时代主题,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提出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指导和处理当代国际关系。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对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继承主要表现在反对霸权、维护和平、独立自主以及团结、依靠第三世界等一系列原则问题上。邓小平强调指出:“中国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领导的时候,就强调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并认为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制定中国的国策,同样也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⑫“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能称霸。……将来我们发展了……如果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实行霸权主义,仍然属于第三世界。如果那时中国翘起尾巴来了,在世界上称王称霸,指手画脚,那就会把自己开除出第三世界的‘国籍’,肯定就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这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制定的对外政策,我们要用来教育子孙后代。”^⑬1984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⑭1984年10月,他在同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谈话时,更加明确地提出:“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这个总政策下,改善同美国和苏联的关系。”^⑮由此可见,邓小平很好地继承了毛泽东建国初期处理国际关系的国际战略思想,不仅考虑到要和超级大国打交道,同时也考虑到运用正确的国际关系准

则,独立自主地发展对外关系。

同样,邓小平也是按照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和方法,不断对世界大局作出全球性的、宏观战略的观察和分析。1985年6月,他在谈到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这一关乎战与和的大问题时说:“这个和平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我们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是不希望战争的。这个和平力量还应该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真要打仗,他们是不干的呀!”^⑧邓小平继承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坚持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争取第二世界,团结世界人民共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对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次重大的战略性调整中。

第一次是80年代初围绕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进行的。六七十年代,随着第三世界的崛起,美苏由对抗开始转为竞争共处,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邓小平认为,多争取一点时间不打仗还是有可能的。1985年6月,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⑨这是邓小平发展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一个光辉典范。1987年5月,邓小平在谈到对总的国际局势的看法时说:“西欧和东欧都是维护和平的力量。……只要欧洲,包括东欧和西欧,不绑在别人的战车上,战争就打不起来。……如果下一个世纪五十年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我看那个时候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⑩根据这种对国际形势的新判断,中国对外政策作了重大调整。从此,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为国内经济建设争取长期稳定和和平的国际环境,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

80年代末、90年代初,针对苏联、东欧剧变以及世界格局发生的巨大变化,邓小平冷静观察,对中国对外政策进行了第二次战略性调整,在对外关系中以突出“自己的国家利益”为特色,使中国外交进入一个更加成熟的新阶段。他说:“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笔者按:指保持经济增长速度,人民生活逐步好起来,国家社会真正稳定下来),就稳如泰山。”^⑪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顺应了新时期国际关系发展的大趋势,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指导国际关系,在新形势下充实了新的内

容;更重要的是它又融进了时代的新变化、新特点,提出了一些新的命题和新的观点,从而把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中的具体运用

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中极为重要的一条。由于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应该考虑应用新政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邓小平强调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⑫。在当代国际关系中,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侵略和干涉活动还相当普遍。这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⑬。“唯一的出路,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相互合作,而不是干涉别国内政、挑起别国内乱。”^⑭这既是确立正常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也是奠定国际新秩序的法律基础。邓小平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不仅适应了当前多样化的世界和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了更为新鲜、更为丰富的内涵。

用“共同开发”和“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国际、国内争端,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中的灵活运用和深入发展。邓小平提出:“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⑮“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⑯实践证明,用“一国两制”的方式来处理台湾、香港和澳门等中国内政问题,的确是一个好办法。

邓小平灵活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创造出“一国两制”方式,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极大影响;他又从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考虑问题,主张把“一国两制”、“共同开发”的方式运用到解决国际争端的实践之中。他说:“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一国两制’,是从我

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点。我说是不是有些可以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有些还可以用‘共同开发’的办法。‘共同开发’的设想,最早也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世界上这类的国际争端还不少。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什么样的和平方式?‘一国两制’,‘共同开发’”^⑥。邓小平灵活应用“一国两制”和“共同开发”的方式,成功地解决了一系列国际争端。在中国钓鱼岛问题和南沙群岛等问题上,他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将有争议的主权问题暂时放一放,共同开发有争议的岛屿及其周围的自然资源。他说:“共同开发的无非是那个岛屿附近的海底石油之类,可以合资经营嘛,共同得利嘛。不用打仗,也不要好多轮谈判。”^⑦当然,邓小平这里所说的“先不谈主权”,绝非“不谈主权”,而是一个如何选择“谈主权”的时机问题,对涉及主权的的原则问题是不能让步的。根据他的这一思想,中国政府向有关国家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得到普遍赞赏和理解,确保了钓鱼岛、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的和平与稳定,也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好评和理解。在中印边界问题上,邓小平指出,“只要双方采取合情合理的方式,你们让一点,我们让一点,就解决了嘛。……只有采取‘一揽子解决’的办法,才有可能各自说服自己的人民。我们和好多国家解决了边界问题,解决的办法无非是双方相互让步。”^⑧按照这一思想,中国同印度、俄罗斯等国家就和平解决

边界领土争端达成了原则协议或共识,缓和了边境紧张气氛。1995年——1996年处理由李登辉访美所引发的中美关系的严重波折,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中灵活运用成功范例。因此可以说,“一国两制”、“共同开发”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最新发展,必然向前延伸,也就是“一个世界,多种制度”。邓小平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建立国际新秩序、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战略思想在实践中的成功运用,显示了这一理论的高度科学性和强大生命力,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光辉范例。

总而言之,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始终贯串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关系实践中的实际运用和发挥作用提供了新的思路,二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仅对中国制定国际战略和外交路线具有重大指导意义,而且对其他国家制定国际战略和从事国际关系实践,对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都具有不可低估的借鉴作用。

注 释:

①②③④⑤⑥⑩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3、57、116、20、282、20、3、104、57、82、127、127、233、355、96、359、361、96、49、87、87、19页。

⑦⑧⑨⑬《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194、369、112页。

⑪《人民日报》1989年11月1日

(责任编辑 叶娟丽)

Deng Xiaoping's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and the Five-principle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Yang Fan

(Wuhan University Law School, Wuhan 430072, China)

Author: Yang Fan (1957-), male, Doctoral candidate, Wuhan University Law School, major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bstract: The Five-principle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is a core content of Deng Xiaoping's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Deng Xiaoping not only succeeded Mao Zedong's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to instruct and deal with t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ith this principle, but also skillfully handled and deeply developed this principle. Thus, this principle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formulating international strategy and establishing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s.

Key words: Deng Xiaoping;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Five-Principle Peaceful Coexistence